

多一点“调工资” 少一点“被拉高”

从今年2月1日起,江苏省各类地区均以超过12%的增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我国受金融危机冲击作出政策调整之后,第一个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与此同时,北京等地也表示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些做法向社会各界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因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工资收入,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人均收入“被拉高”现象不容忽视

“说到富民问题,其实我很清楚,60%的百姓口袋里达不到每年公布的收入平均数,是‘被拉高’的。”1月19日,时任南京市代市长、现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在这个市政协科协界、工商联以及港澳、经济界等联组讨论时说。

这句话立即引发了各界人士对于百姓收入“被拉高”的热议。事实上,长期以来的人均收入的某些统计数字,不仅难以分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别,同时也难以分辨同行业不同级别员工间的工资差别。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显示,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到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为5到10倍。

在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克服重重困难,总体回升向好,但是政府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因而很有必要作出调整。

财政部统计显示,2009年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收入6.34万亿元,同比增长9.2%,高于同期经济增速;其中行政收费等非税收入同比增长高达27%。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基本与GDP增速持平,明显低于财政收入增速,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拉大。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两会”上,部分委员提出,目前一线职工普遍感觉工作强度大、工资低。农民工北京市副秘书长刘迎说,目前大部分百姓收入较低,提高收入水平应该逐年增长,随着CPI的增长而增长。

专家认为,我国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已制约了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低收入职工来说,面对收入分配的制度障碍,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生活状况。

这种收入分配的方式,还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路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不



(资料图片)

仅是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瓶颈,也不利于我国转变以内需拉动为主的发展方式。

提高工资具有良好示范效应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省市开始解决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如借助地方财力的增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的一个重要举措。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处长金鑫介绍,这个省将分三类地区分别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线,幅度均超过12%,以南京市区、苏州等一类地区为例,从850元调整到960元,增幅为12.95%。

金鑫说,在经过精密测算并通过工会组织、企业家协会和企业联合会的三方协商机制多次沟通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案第一时间得到了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批复。

江苏省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江苏城镇居民高低收入差距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有所扩大。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2.2%,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7.7%。高低收入的差距由5:1扩大到5.8:1。

“如今政府有能力,企业也有能力承担这样的支出,我们的目的是实现经济转型、企业发展和保障民生的良性互动。”金鑫表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江苏省改善民生的重要举

措,也是江苏经济企稳回升的积极信号。“工资上调对我们找工作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加薪对我们工人来说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能促进生产力。”在南京市安德门民工市场,外来找工作的农民工程广元和杨明山这样对记者说。

与此同时,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拟最早于2010年4月初恢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2009年下半年,北京的经济和就业状况都比较好,此外物价和水价都有所上浮,这些都是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条件。”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相关负责人说,北京拟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0%左右。最终上调幅度将根据北京市经济发展情况经市政府批准后确定。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松表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同步提高收入水平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直接影响收入结构的调整,对整体劳动收入的高低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后,水涨船高,未来其他工资水平也将随着有所提升。

期待更多的政策“组合拳”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仅仅是实现社会均衡

发展,调整收入分配的举措之一,实现这一举措,还需要打出更多的政策“组合拳”,才能最终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

“事实上,即使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比较低廉的,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具有比较优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汝熹表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逐步的、长期的过程。

高汝熹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我国经济也处于恢复阶段,各地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要把握一个度,避免大起大落,打击正在恢复的经济。

“虽然企业里面拿最低工资的员工不多,但是对成本或多或少会有些影响。”昆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玉山分会会长、星谊陶瓷董事长蔡国祯近日对记者说,新的最低工资政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成本,另一方面,也会淘汰掉部分最低端的制造企业。

专家认为,对于企业界来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工资成本的上升。

金鑫介绍,为了帮助企业降低因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增加的经营成本,江苏省相关部门将帮助企业减负稳岗,力争消化企业提高的用工成本。

这个省将继续实施“五缓四减三补两协商一简化”政策。以“五缓”为例,原先规定对暂时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困难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缓缴应由企业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项社会保险,缓缴执行期为2009年之内,现延长到2010年。

金鑫表示,针对江苏省台资企业密集的特点,今年将继续加大对台资企业的帮扶力度,切实减轻他们的负担。

与此同时,这个省还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保障职工工资及时到位和收入稳定增加:一是由企业和职工共同协商工资水平,让劳动者在工资收入中享有充分的话语权;二是在省内13个市全面建立起工资指导系统,定期发布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企业用工成本;三是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查处力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是由市场竞争机制和政府行政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想撬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必须通过社会政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进行市场干预。降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权重,增加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的权重。

相关链接

各地“两会”召开以来,多个省市传出“涨工资”的风声,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

低工资标准。此外,北京市、重庆市、东莞市等也纷纷表示初步具备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条件。专家认为,经济形势回暖是各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首要前提。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形势回暖,经济回升走出了人们事先敢想而不敢求的V形轨迹,GDP逐季上升。分析人士称,此举对国家、对个人,甚至从长期来看对用工企业都有利好。

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今年拟上调

“北京市目前经济已复苏,初步具备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现行每月800元)的条件。”1月24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侯小川表示,今年将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江苏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包吃住也要支付最低工资

从2月1日起,江苏实行新的月最低工资标准。记者近日了解到,此次各市区、县执行的类别若需变动,将按照《江苏省企业最低工资暂行条例》,在本次通知公布之日后20天内,由各市、县人民政府提出本行政区域内的具体类别调整方案,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南京市区最低工资标准涨到960元

重庆今年将提高最低工资 医保最高可支付人均收入6倍

在13日召开的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重庆市委常委、副市长马正其要求着力改善民生,并提出具体目标。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侯小川表示,今年将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待遇水平,提高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东莞欲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各方热议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光在“两会”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东莞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此言一出,关于东莞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应该上调的话题引起各种争论。东莞市副市长江凌表示,现在用工的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用工已经进入“90后”,或者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新群体为主体的时代,这一群体对用工的环境、待遇有更多的要求。如果企业不适当调整、改变用工待遇,难以解决企业用工难的问题。东莞跟深圳、广州等周边城市相比,最低工资的水平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这样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有利于改善东莞的用工环境。

上调对未来三大利好

对个人:可以提高最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对国家:此举措的一大意义在于调整产业结构,还可以增加国内消费能力,促进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增长型转变。

对企业:新的用工最低工资政策淘汰掉部分最低端的制造企业。

据新华社

新闻时评

“违法讨薪”已是最后一根稻草

1月31日,上百农民工立交桥上堵路讨薪,致郑州市主干道交通堵塞。一农民工代表称知道堵路是违法行为,但是迫不得已。(《河南商报》2月2日)

新闻中,一位农民工这样感叹:经过多次交涉,拖欠方都不理不睬。她曾找过郑州市建委清欠办和办公室,还曾多次找过北林路办事处,但对方都要他们去找建筑公司交涉,然而建筑方的负责人却迟迟不肯现身。“我就像皮球一样,被一脚踢过来,一脚踢过去。”万般无奈之下,这群农民工这才堵路讨薪,以胁迫公共利

益为“要挟”,明知违法还是要展开“违法讨薪”。如果像这样几近雷同的一幕,已经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次。这样的“违法讨薪”,不仅危害公共秩序,还充满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过激行为,就很容易酿成悲剧或者群体事件。而就算是讨薪成功,也有可能面临着警方的处置。广州媒体曾经报道,广州市公安部门表示,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处罚,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目前此法收效显著。喜滋滋地拿到工钱,却要狼狽地接受法律制裁,“违法讨薪”的“杯具”就真正变成悲剧。

跳楼讨薪也好,堵路讨薪也罢,当然影响到了公共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可如果通过正常的渠道能保障自己的权利,谁还能去“违法”?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试图以“出格”的行为引起舆论和政府部门的关注罢了。所以,“违法讨薪”虽然在客观上破坏了公共秩序,但主观上却没有违法恶意。事实上,这样形形色色地以“跳楼”或者“堵路”为“看点”的权利表达,无不暴露出制度保障和制度经济的乏力甚至是缺位:是不是穷尽了一切努力去回应和维护弱势者的权利诉求?劳动维权渠道是不是随时保持畅通无阻?

城市管理的难处需要考虑,公共资源的无谓消耗令人痛心,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跳楼讨薪者的“冲动”,其实是弱势者权利屡屡受到侵犯、制度化维权途径不通畅、大众维权成本过高等权利语境的一个折射——“违法讨薪”已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果“违法讨薪”仍然不能维权成功,这些弱势者的权利诉求就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就只能是无奈的叹息和满腹的心酸。 陈一舟



中介腐败 近年来,由于行政机关系和中介机构没有彻底脱钩,很多官办中介行政职能转化为“有偿服务”,成了腐败的“灰色通道”。 焦海洋 文/图

用物业费遏制高房价好像关公战秦琼

早在2003年,我们就在北京、辽宁、江苏等10个省

市分两批进行“房地产模拟评税试点”。尽管这些省市的物业费都属于“空转”,没有实现点滴收,但一切税收环节都与真正收税一样。然而,6年多过去了,虽然媒体和舆论,过一段时间就会炒作一番物业税的开征问题。但物业费至今仍未有清晰的眉目,以及具体的征收模式,这意味着,物业费这个新税种,前景不仅不明朗,而且充满变数。

尽管国家出台物业费,是大势所趋,但要让它承担平抑高房价的重任,实属一厢情愿。正如网友所言:“指望物业费来遏制虚高的房价,无疑是‘关公战秦琼’。”一方面,物业费与房价的本质属性不尽相同。物业费是一个税种,它的征收最后要纳入财政的盘子,属于公共财政范畴。而房价则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商品

房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主宰的,需求是刚性的,而现在购房队伍规模庞大。即便征收物业税,也无法改变供求关系,进而也无法改变价格。显然,倘若用物业费这个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制度安排,来抑制高房价,与其本质特征严重背离。

与此同时,土地出让金不会纳入物业费范围,目前仍没有明确说法。就眼下而言,在房地产开发领域,“沉重如山”的租,“五花八门”的费以及“多如牛毛”的税,早已让开发商不堪重负,尤其是相当一部分收费与土地出让金结伴而生。因此,倘若土地出让金不纳入物业费范围,倘若在物业费征收前,不进行一次彻底的税费整合,这些税费只能是增无减,最终还将被转嫁到购房者身上。如此一

来,物业费实际上就只是一个新添的税种,而不会对现行房地产税费进行清理“瘦身”,房价无疑也将因此上涨。此外,开征物业费,还可能诱发新一轮囤地运动,进而会继续抬高房价。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近期开征物业费,很可能采取低税率,可能1%,这意味着,由于物业费税率较低,持有土地需要缴纳的物业费与飞升的房价相比不过是毛毛雨。因此,开发商会受利益趋动的引导继续囤积土地,这也是当下许多开发商抢地囤地的原因。去年央企“不务正业”,频频地王桂冠,就印证了这点,类似囤地运动的泛滥,不仅严重扰乱了房地产市场,也会加剧房价的进一步上扬。

显然,无论是从税收本质上,还是从实践来看,物业费都不是降低房价的灵丹妙药。 吴睿轲



由章子怡“诈捐门”反思“偶像文化”

波墨、A先生、诈捐。章子怡又一次被吹到了风头浪尖上。尽管章子怡通过官网就近日网络上指责其诈捐的帖子以及媒体报道作出了说明,欢迎各界的质询。但是,这个声明并未得到网友的认可,甚至有网友给她冠以“余秋雨第二”的头衔。(华西都市报1月31日)

诈捐门究竟是章子怡忽悠了我们,还是章子怡被那些老外“口头捐赠”忽悠了,我们不得而知。对于有些艺人来说,炒作抑或负面新闻可能会让其越炒越热,但是对于“国际章”来说,这样连续不断的负面新闻肯定会让其声誉大受影响。更何况相比于现在演艺事业发展顺风顺水的范冰冰、赵薇来说,如今的章子怡则事业受阻、星光暗淡。从“中国章”到“国际章”,章子怡已经

不单纯是一个中国演员。正因如此,公众对章子怡才有了更多的期待,有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章子怡来讲,这种期待既是一种鼓励同时也是—种责任。我从未否认章子怡为传播东方文化所做的贡献,但是如果“诈捐门”真的属实,这无论对于章子怡还是国人来说,无异于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不意味着“国际章”声名扫地,随之倒下的还有国人津津乐道的“国际巨星”、“国际偶像”。

挺章者说:“难得出一个‘国际章’,我们还是爱她吧!”而倒章者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都怪你当年太张狂。”章子怡究竟是不是“余秋雨第二”,有没有诈捐,我们需要的是不是由着自己的爱憎互吐口水,而是需要—个真相。面对网友的质疑,章子怡能不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有余秋雨“捐款门”不明不白的前车之鉴,所以才有了网友对章子怡会不会成为“余秋雨第二”的担心。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论语》都有效果。年纪轻轻就出国门,蜚声国际影坛的章子怡小姐一度被解读为我们的“英雄”,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亮点。然而面对“波墨门”、“诈捐门”事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对“国际章”的期望是不是有些太高。如果章子怡真的“诈捐了”,我们怎么办?是该唾弃章子怡还是痛恨我们自己?其实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偶像,只不过追捧的人多了,一个人就成了偶像。关东客

城市白领为什么早衰

最近重庆有关机构的一份数据显

示了日益恶化的中国城市人群健康状况:脑溢血这种老年人的病症已经渗透到30多岁的人群中,“三高”人群也逐年年轻化。这份数据和《2009中国城市健康状况调查》所揭示的全国性数据大致相似,而一项调查回答答卷300份,针对的是北京、上海等十余个城市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阶层。其结果表明: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达76%,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不到3%。

与我国相反,在发达国家,白领的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近年来却是突飞猛进。2008年哈佛的一项研究揭示:美国受过12年以上教育的人口(主要是白领),平均寿命已上涨到82岁。除了白领医疗状况好外,最大的原因就是白领的生活习惯好。比如,白领比蓝领的吸烟率要低得多。美国白领的饮食也非常清淡讲究,甚至有人给自己定出卡路里“预算”,严格遵守。

为什么中国的白领不能如此?以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可以归纳出几大原因。第一,中国的教育轻视体育。“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观念深入人心,美国则正好相反,体育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学校的运动明星往往也业于业外。对白领来说,体育是终生之事业,乃至七八十岁还乐此不疲。《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Brooks曾在书中写道:在河上荡舟时你会发现,开机动游艇的经常是劳动阶层,在那里吃喝玩乐划艇的往往是白领。当然,一天到晚骑自行车的也是白领,蓝领多半开车出门。

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影响到了个人的价值观念。中国的白领对成功的界定太狭隘,动不动就要攀比年收入。美国的白领则相对比较重视生活方式,有不少人宁愿放弃高管职位以更多地和家人待在一起。

第三,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陋习太多。比如,谈生意一定要吃喝,白领这方面机会太多。每周要到宴会应酬,白领这方面机会太多。要染上“三高”。最近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市场,私车的流行,将进一步减少本来就非常少的肢体活动。我有朋友,刚当教授就买了辆车。后来他承认,开车几年,屁股越来越大,最终盖住了整个驾驶席。

未来几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开始缩减。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形成了严峻挑战。迎接这种挑战,首先需要当局的劳动人口尽可能地延长工作寿命。另外,中国要迅速进行产业升级,建设能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创新型社会”。这就特别需要白领阶层的聪明才智。如今白领的早衰,威胁着的不仅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有智能资源。整个社会都应该为之警醒。 薛涌